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 陈晏清哲学文集

第八卷

---

我的哲学人生：回顾·回忆·回想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 陈晏清哲学文集

第八卷

---

我的哲学人生：回顾·回忆·回想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晏清哲学文集. 第八卷, 我的哲学人生 : 回顾·回忆·回想 / 陈晏清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5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ISBN 978-7-310-05363-6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晏清—回忆录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77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立松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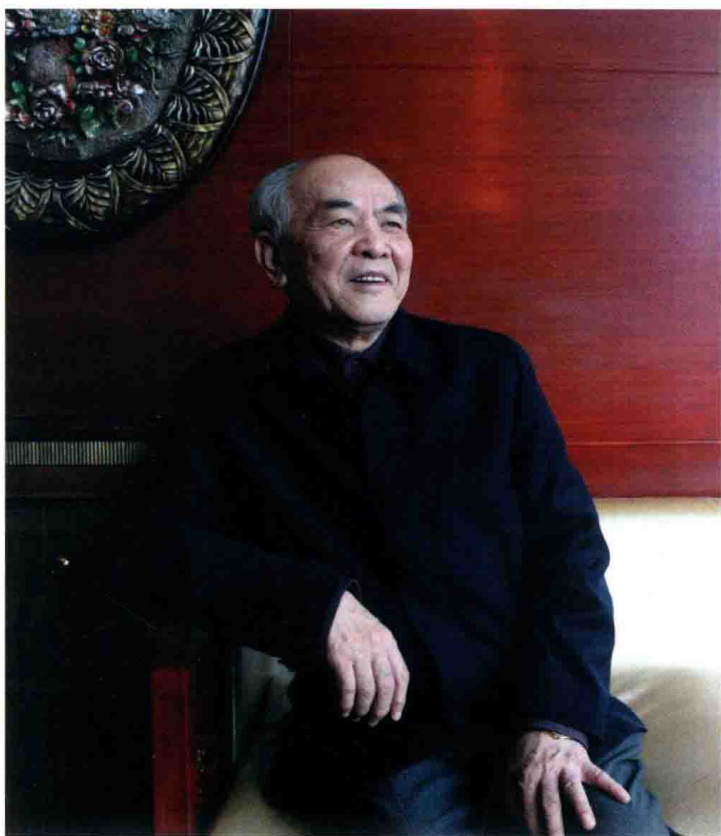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6 插页 301 千字

定价: 9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2015年，《人民画报》记者 王蕾摄）

陈晏清（1938— ），湖南省新化县人，南开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6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南开大学任教。1985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人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顾问，天津市哲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



#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 关于导论

简单地说,就是把通常教科书绪论的内容,纳入自由与必然问题的行程去阐述。

1) 探讨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总纲把握),人和世界关系中根本性的关系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其最深刻的实质则是必然和自由的关系。自由和必然关系,不仅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一方面,或者比它更(如唯批)所述),而是它的实质。由这一实质有规律地存在着关系,又会(更)宽阔、更深入。

(使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加考察)

2) “斯宾诺斯之谜”。写哲学史。如看到汉语史所述,这个问题是像斯宾诺斯一样向每一个思想家提出来的,解不开这个谜,就吃掉了他的体系。是许多思想体系之命运的问题,即命运之能超越之问题。事实上,历史上一个个的哲学体系都被它吃掉了,唯马与公解开了这个谜。直接此思想体系。

3) 马与公探讨何以成为人类解放的头脑。马与公以探讨就为人道解放而论证,论证为解而自由与必然问题之谜而产生。这是,论证的解和空谈和解,同时探讨问题提出,并给人一种启示,马与公何以以此强调“改造世界”的实质,乃是同他对于整个哲学精神之把握密切相关。

20×20=400

第 页

作者手迹：讨论《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写作时的谈话提纲

##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的是我近几年写成的回忆录，基本上是一个学术自传。初稿写出后曾十易其稿，几次修改都是在做减法，即删去一些与学术无关的内容，有的是整个事件、整个故事的删除。曾设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目，写了近四万字，一直保留到书稿送印刷厂之前，最后还是决定删去。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是早期盲从，中期彷徨，后期觉醒。我写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无疑包含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思考。删去这一目，绝不是认为可以不论“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不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但是，分清是非，总结教训，都应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而不可太纠结于个人的是非恩怨。不仅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如此，对待其他事情也应如此。有些曾在许多年里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从纯粹“私人”的角度说确实难以放下，但把它们夹杂在哲学学术经历的叙述里，却很显琐屑，在逻辑上没有安放它们的位置，不如删去。这样改来改去，学术性是增强了，故事性、可读性却减弱了。

这几年，我一直想要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作做个总结，却没有想过出版一部比较全一点的文集，这个心愿只好通过撰写回忆录来实现。现在南开哲学院决定出版我的多卷本的文集，这同我写回忆录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想为后人特别是南开哲学院的后继者们留下一点历史资料。因此，让回忆录搭文

集的车，作为文集的最后一卷出版，也不算勉强，而且这一卷和前七卷还有非常密切的配合关系。前七卷记载了几十年里我在学术上做了一些什么事；这一卷则说明这些事我是怎样做的，做的时候是怎样想的，遇到过一些什么麻烦和问题，这些麻烦和问题是怎样排除和解决的，以及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或者说我理解到了的意义），包括实践意义、学术意义乃至学术史的意义，等等。这两种历史资料放在一起，便于有兴趣阅读这个文集的朋友将它们互相参照，这也许更有助于增强阅读效果。

我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努力弘扬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本性的哲学精神，为我自己、为我的学生、为我所在的学科培育一种新的学风，即强调现实关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这是本卷的基本思想线索，也是整个文集的基本思想线索。

# 目 录

序 言 .....	1
我的故乡和我出生的家庭 .....	5
一、我的故乡孟公桥 .....	5
二、豆腐世家 .....	11
人生起步时期（1944—1957） .....	16
一、我的启蒙老师 .....	16
二、遭遇一个荒唐的诊断耽误了学业 .....	21
三、以“备取生”的资格升高中 .....	28
四、挑着行李上北京 .....	36
五、惊险的一“漏” .....	42
六、选择了哲学人生 .....	51
人大五年（1957—1962） .....	56
一、类似“半工半读”的教学秩序 .....	56
二、人大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	85
初到南开（1962—1966） .....	94
一、南开最初印象 .....	94
二、站稳三尺讲台 .....	102
三、“反修防修”和“四清”运动 .....	109
社会大动荡后的沉思（1977—1983） .....	121
一、对“四人帮”哲学的系统批判 .....	121



二、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主要错误哲学思潮的 清理·····	130
哲学教科书改革（1980—2001）·····	153
一、“跪一条腿造反”·····	153
二、中国哲学家考察团活动始末·····	160
三、“哲学体系改革研究”课题组的天津会议·····	173
四、“哲学体系改革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183
五、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	191
在社会转型中推进哲学研究的“转型”（1984— ）·····	203
一、哲学的困境·····	203
二、社会哲学研究·····	208
三、社会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政治哲学·····	235
四、参与创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	249
中央电大第一任哲学主讲（1982—1988）·····	261
学术行政工作经历（1985—2000）·····	273
一、民主选举的系主任·····	273
二、系主任不是“官”·····	277
三、沉重的责任·····	300
学术家园的营造·····	317
一、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创建·····	317
二、创造学科特色·····	323
三、活跃、严谨、和谐的学术家园·····	328
我的家庭生活·····	342
附录一：陈晏清指导的研究生名录·····	364
附录二：陈晏清年谱·····	372
附录三：陈晏清学术成就简介·····	388
后    记·····	407

## 序 言

2007年秋，学生们给我做70岁的生日，同时编了一个纪念性的论文集，收录了历届毕业研究生撰写的社会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元敏<sup>①</sup>为这个论文集欣然作序，其中有一句话对我颇有触动。序言里说：“对于一个辛勤耕耘的学者来说，70岁可能意味着已经到了可以总结些什么的时候了。”这话似乎表达了学生和亲人们的一种期望。于是，我萌生了写点回忆文字的念头。

在人们的印象里，写回忆录的人都是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或传奇式的人物。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写什么回忆录？写一点自己经历的个别事件或许还可以，要写自己的一生就不免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但我又想，从对于历史的认识来说，应是有多重维度的。处于历史事件核心即历史漩涡中的风云人物，他所做出的回顾和前瞻固然会有重要的价值，普通人的回顾与思考，也未尝没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任何有一定历史理解能力的个人，他叙述的经历和感受只要是真实的，就多少会有一些价值。把写回忆录作为一种总结自己工作、思想的方式，也不妨试一试。

我在旧社会生活了11年，随父母受过一些苦，所见所闻所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时段不长，但对我的人生道路的

---

<sup>①</sup> 即邢元敏，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天津市政协主席。

影响却不小，尤其是在早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是跟着共和国的步伐行进的。大体上可以说，国家发展顺利的时候，我个人的发展也比较顺利；国家发展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我个人的发展也受到挫折。共和国经历的几个年代都在我的身上打下了烙印，但在哪个年代都没有太极端的表现，既没有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没有真正遭受过大苦大难，所以我的回忆录“故事性”不强。但从另一方面看，我的成长过程和它的历史条件之间的关联反倒因此而显得简单明白。这一点，恐怕也正是这一类人的回忆录的可取之处。

我做了一辈子哲学教员，所以给这个回忆录取名为“我的哲学人生”。哲学的人生应是永不停歇地追寻意义和智慧的人生。因此，所谓“哲学人生”不仅指终生从事哲学事业，而且指用哲学指导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首先应当成为我自己的哲学，而不光是用来教别人的哲学。我写过一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和书，这固然也是我拿来领取“皇粮”的凭证，但其首要的意义还在于表达我的信仰。我是由信仰马克思主义才自愿地走上哲学的道路的，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中学生所知道的哲学，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信仰我一生都没有改变。

在“我的哲学人生”的标题后面，加了类似副标题的“回顾·回忆·回想”六个字。这是近年来向年轻人学到的一种书写方式，不知道合不合乎汉语的书写规范。“回顾”“回忆”“回想”这三个词含义几乎相同，只有一点难以说清的细微差别，这恰好可以用来表述回忆录的三个本来就无法清楚区分开来的维度。回顾主要是讲近80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是大背景的回顾；回忆主要是讲个人的经历，是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在我自己身上或我周围发生的一些往事的记忆；回想则

主要是讲思想的演变，特别是哲学认识的转变，这是整个回忆录的落脚点，也是它的核心内容。我力图把这三个维度结合得好一些，讲个人也是讲社会，从个人的经历讲社会的变化；从个人哲学认识的变化这一侧面讲国家哲学状况的变化，也从国家哲学状况的变化透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我的哲学人生”的基本线索，就是讲我是怎样走上哲学的道路的，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是怎样走的。前面两题讲了我出生的家庭和我的童年、少年时期，这同我怎样走上哲学的道路有密切的关联；后面各题就基本上是讲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怎样走了。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开始的。我曾经借用新儒家常用的“返本开新”这个词来概括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发展的历程。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所谓“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这实际上也大体是我自己学术活动的历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四人帮”哲学的系统批判，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哲学思潮的清理，以及以清除苏联教科书哲学的消极影响为主要目标的哲学体系改革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种“返本”的工作。“返本”是为了“开新”。在我看来，“开新”应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原理的创造。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我是将其作为“开新”之举来对待的。

我从不到6岁走进学校，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由学生而教师，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但我从来不愿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粹”学人。进入大学的哲学系，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教育之后，我越来越懂得，关注社会现实，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正是哲学应有的宗旨。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为我们培育的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的学风，后来成为我治学的基本风格，几十年都坚守不变。我常常想，我这样的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注定成不了什么大学问家的。但是，努力去推动哲学的进步，使哲学变得更加有用、更加有益于社会，则是我应该做到，而且从原则上说也是可以做到的。几十年哲学生涯得到的最重要的体会是：现实生活是哲学这棵大树生长的厚土，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动，才能真正推动哲学的进步。一些具体的工作不免留下诸多遗憾，但我对自己确定的这个学术方向却从不后悔。

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我再活一遍，就不会如何如何。这当然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叹。但只要真是“诸葛亮”，就会是有益的，尽管是事后的。我已经不可能在哲学的路上再走一遍了，但我的学生们还会接着走。写这部回忆录的实在意义，不过是给我的学生们，也给我的后代，留下一些有教益的东西；同时，也给我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南开大学哲学院（前身为南开大学哲学系）留下一些历史资料。

# 我的故乡和我出生的家庭

## 一、我的故乡孟公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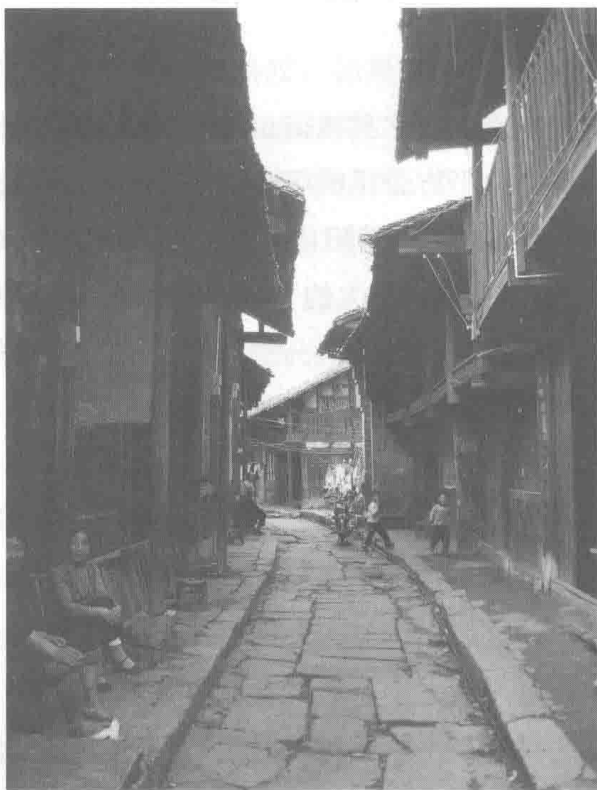
我的家乡湖南省新化县横阳山是一个美丽的盆地，它四面环山，中间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平川，酷似一口大锅。抗日战争时期流行这样的歌谣：“横阳山是个锅，日本鬼子来一个煮一个。”横阳平原是新化县最大的平原。平原地区土壤肥沃，耕地多为水田，人口也颇稠密，但一进入周边的山区，却是另外一番光景了。特别是西部山区，那是真正的深山老林，相隔好几公里才能见到几户人家。我的姑妈就嫁在这深山里，她家的地名“jue ba qi”说得出来却写不出来，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直至不久前才搞清楚，那个地方叫作蕨芭溪<sup>①</sup>，“jue ba qi”是新化方言。20世纪50年代初，那里建立了一个“新开乡”。新开，就意味着那个地方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乡”。

我出生的村庄在平原地区，叫孟公市。据《新化县志》载，此地明末时名钟家岭，清康熙年间更名为孟公桥。道光年间设立了圩场，因而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叫孟公市了，但人们还是

---

<sup>①</sup> 我的学生荣新海（曾任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在读这本回忆录的征求意见稿时，在互联网上通过百度地图寻找，果然在距今孟公镇8公里多（直线距离）的地方找到了蕨芭溪。地图上显示，那一带附近是大片空白，表明是无人居住的高山。

叫惯了孟公桥，“孟公市”是一个多在当时官方文书中使用的正式称呼。不消说，这孟公市的“市”乃集市之市。圩场建立后，这里成为一个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人口也就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长约 500 米、宽 2~3 米的青石路面街道。听说现在路面两旁的房屋拆的拆、倒的倒，已是残破不全，但青石街道还保存着。这条青石街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儿时的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像戏剧一般在这里上演。我在有生之年的一个心愿，就是再回到这条青石街去走一走。



家乡的青石街

孟公市虽处平原地段，但仍有几分山村景色。从村庄往南看去，很是开阔平坦，而北面和东面却只相隔几百米便是小山岗。西面距山稍远一些，但也不算太远，离孟公市不足 3 公里

的地方有个村子就名叫“山底下”。在孟公市村边的一片水田中间，凸起了一座小小的岩石山岗，并依山建造了一座石龙寺。这算是孟公市的一个景点，是儿童们心目中的胜地，我们儿时常在这岩石山上游戏玩耍。但是，现在这些都只是在老人们的回忆中存在了。我在北京上学时，从1957年暑期到1960年暑期前整整三年没有回家，1960年暑期回到家乡一看，真是满目疮痍。这岩石山已被夷为平地，说是这岩石可以烧石灰，它便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全部变成石灰了。村庄四周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也变成了一片片黄土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我还没有离开家乡时，孟公市有三百多户人家，人口将近两千，在中国的南方，算得上一个大村子了。它实际上是一个小镇，但直到80年代才正式建立了孟公镇。这里人口多，但耕地少，1950年土改时，贫农分得的土地人均不足半亩。因此，这里的人们不能完全依靠土地过活，除了种地之外，大多数的人都还要搞点副业，或打短工，或做点小生意，纯粹的农民在村民中不占多数。大概是同这种生存需要相适应，这里纯粹的、一字不识的文盲也在村民中不占多数。40年代，孟公市就有两所初级小学、一所高级小学和一所初级中学。两所初级小学建在两座祠堂里，即在陈氏祠堂和刘氏祠堂分别建立了陈氏小学和刘氏小学。这两所学校在办学上还有所竞争，这有利于保证基本的教育质量。由月塘曾家创办的广益高级小学虽坐落在孟公市，但它是面向周边许多村子的，来这里上学的学生离家最远的大约要超出5公里。1944年，又由月塘曾家创办了维新中学（现名新化县第二中学），校址紧挨着广益小学。曾家创办这两所学校，尤其是维新中学，真是造福乡里，功德无量。成百上千的有志青年，都是经过这所中学，走出贫困的山沟，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就我当时的家



境而言，如果没有这所学校，肯定是要辍学的。月塘曾家是我祖母的娘家。50年代后，政治运动频仍，曾家也多变故，但我对曾家人始终怀着真挚的亲近感。这种情感显然是同对于这所母校的感激连在一起的。此外，孟公市还有两座寺庙，石龙寺和孟公庙。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孟公市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和一座福音教堂。这种文化景象，在旧中国的农村，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罕见的。

我的一位同乡和同行曾盛林，是1964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家所在的村庄离孟公市不足1公里，是个小村庄。在北京上学时，他跟我说：“你是街上人，我是村里人，你脑子比我活。”当时我觉得他的这番话怪诞得很，所谓“街上人”“村里人”对于解释我和他之间的差别没有任何意义。但过后仔细想来，就总体上说，他的话不无道理。孟公市的人们比较灵活、开放，这主要是因为，这里集市贸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比较发达，再加上特殊的生存境况，使他们不能墨守成规，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这里的年轻人都不恋家，都想跑出去闯世界，而且似乎跑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光彩。1949年以前，已有不少人在外地做事，或做生意，或在某种机构任职，或当兵，当兵的国共双方都有。1949年以后，出去的人就更多了，基本上是通过上学和参军两个途径。20世纪80年代我回家乡，听邮局的人说，孟公桥天天有汇票寄来，家家户户有人寄汇票回来。这种比较特殊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使孟公市所造就的民风也和周边的村落有所不同。一方面，许多人还保留了山区人的质朴；另一方面，人们的利益意识也颇为强烈。自我记事起，就看到利益纠纷不断。这里的人们似乎在性格上大都过于“外向”。既要争得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又没有经受过规范的、良序的市场经济的熏陶，